

增长极理论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程前昌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增长极理论是区域开发中常用的重要理论之一, 有必要考察其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向。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 分国内与国外两条主线, 回顾了增长极的理论发展过程以及增长极有关理论的实践效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证明增长极具有高度的可行性, 取得了不少成功的案例。尤其是中国学者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并广为实用的点轴开发理论和网络经济, 具有更为强大的实用性。但现有的研究中, 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针对实际问题, 最后对增长极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展望。

关键词: 增长极; 点轴; 城市群; 进展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增长极理论是用于分析区域发展的众多方法之一^[1]。增长极战略通常是将所涉及到的重点投资置于有限数量的空间区位上^[2]。而空间性是地理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本质特征之一^[3]。增长极战略, 与其它大多数战略相比较, 它往往是具体的, 决定性的, 当然, 也不允许有更大的灵活性^[4]。增长极理论是一种合成的理论, 它在解释地区的发展过程中, 阐明增长中心诱使周围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假说^[5]。即增长极是区域内具有创新能力和较高增长率, 并通过创新和扩散带动周围区域发展的地理空间^[6]。

增长极理论是西方区域经济学中不平衡发展观念的主体依据, 经过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使增长极理论成了区域规划工作中的流行理论。该理论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理论, 为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指导意义, 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 增长极理论的依然是区域发展中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增长极概念的贡献是关注到了经济空间和地理空间本质上的不均衡性, 并试图利用这种不均衡性来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政策, 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7]。增长极有大小之分, 大者如大型城市群, 小者如小城镇, 增长极也有性质之别, 既有综合性经济体, 也有专业化特征比较突出的经济体^[8]。增长极在地域上的集聚, 且通常集中在中心城市, 从而构成了空间增长极, 它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 不同规模的中心城市构成了空间增长极的等级体系^[9]。本文旨在回顾有关增长极理论的国内外研究及其实践状况, 并得出相应的启示, 以期进一步地为增长极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新的科学参考依据。

1. 国外增长极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1.1 增长极和增长中心

1933年, 德国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特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了“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是相对于分散聚落而言的, 中心职能的影响范围较大, 就可称之为较高级的中心地,

收稿日期: 2013-5-4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研究”(11JZD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城市群的培育和建设研究”(11JJDZH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程前昌(1983-), 男, 重庆长寿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规划与区域发展规划。

不具有中心意义或发挥较少中心作用的较小地方称为辅助中心地,城镇的主要职能是充当区域的中心^[10]。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任意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向外扩散^[11]。极是大大都市地区,它能影响一国之民的一大部分领地,而中心则是一个小城市,其相对影响范围就不如极的影响深远,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常通过增长中心政策来努力营建新的集群生产、交换,并在那些原本不存在相互作用的地方建立起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希望通过增长中心来改变人们的传统作用网络或破除对外围的依赖和隔离^[12]。其实,增长极必定是个可生长发育的中心地,小的增长极也可视为小的增长中心,因此,也将增长极叫做增长中心。在马其顿共和国,增长极概念通常强调地理位置,也叫做增长中心,增长中心是与集聚有关的一个概念,增长极一直在分析区域经济轻重问题上具有重要性,增长极思想在制定区域政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3]。在经济贫困糟糕的区域出现增长中心是存在的,也是可鉴定的,或者是可创建的^[14]。也就是说,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的时候,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一起形成增长极、增长中心,发展起来后再扩散出去,是可行的。

1966年,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劳尔·布代维尔(Jacques Raoul Boudeville)将增长极的发展功能同城市的集聚体系联系在一起,认为一个增长极或增长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城市的集聚优势和多种功能,其扩散遵循中心地的等级扩散^[15]。1969年,威斯康辛大学的约翰·坎贝尔指出增长极理论必须回到更广阔的基础上来,而不是单一地继续将产业内部关联作为该理论的首要因素,收入增长和复合影响因素,以及外部经济和不经济,也务必加以发展,这样的转变强调才能将经济地理空间的差异性的内涵重新识别到位^[16]。1971年,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马龙·胡佛(Edgar Malone Hoover)认为,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真正相当大的中心城市,发展条件就会是很不利的,小城镇增长不如中等规模城市快而稳定,其收入水平较低,再就是兴建基础结构、举办城市公用事业,成本显然更高^[17]。1974年,本杰明·希金斯教授(Higgins Benjamin)认为增长极是区域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当大部分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时,推动型区域以及城市中心就是中心地,通过中心地对外的扩张来带动发展;然后进入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阶段,城市就在自然资源的附近发展,该阶段的城市就是一个发展极,通过煤、铁矿区域的钢铁工业的扩展带来收入和就业;到了第三阶段,推动型产业就是以人力资源为基础,突破了周围地区的限制,都市中心再次成为中心地^[18]。

当然,增长极也不见得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增长极和增长中心的选择也是有其依据的。1972年,美国学者森普尔·基思(Semple R Keith)等人就曾研究过增长极的两种类别,一是自然形成的增长极,而是政府调控经济增长所形成的增长极^[19]。美国伍斯特州立学院的穆雷先生认为新增长中心的选择应当符合以下标准: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具有可开发的人力资源;具有最优的城市路径让全部市民都能靠近市中心;地方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具有可识别的比较优势;能够防止不经济的集群;让所服务的地方等效^[20]。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娱乐场所也可用作增长极,但是,这样的战略则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成本效益,社会的犯罪成本定然会高于经济效益,此外,还可带来再分配效应,一些当地居民也会受到罪犯溢出效应的影响,从而导致获得的好处更少或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当国家把赌博作为区域发展的工具时,就应该认真考虑代价预防和再分配的影响^[21]。日本经济体在亚太地区所起的区域增长极作用也仅限于它作为一个资本货物供应基地的功能^[22]。区域的功能作用应该集中在少数中心,但是,增长极也不能单一地建立在企业的基础之上,经济社会环境性质对增长极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尽管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但也不能代表决定增长极发展的起始点,认同功能活动能力的集中也是必要的,增长极的发展还必须考虑到特定区域发展的综合优势,增长极理论不仅是欠发达地区的战略思想,也可用于现存的大尺度中心的限制发展之中^[23]。

1.2 增长极理论的实践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曾经对增长中心理论有过大量的批判,主要是从理想、理论、政治和实践是个方面展开的,但是,对区域规划可选择的理论基础的搜索仍然是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理论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少是清晰明了的,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极化规划,而且以极化努力的经验基础的整个区域规划都遭到了排挤^[24]。对生长点和增长极问题而言,英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立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新工厂都集中在或接近于几乎所有是大城市,因为那里有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但这并不证明增长极理论的价值^[25]。对私有企业的资本主义模式和增长极理论的采用形成了不平衡的发展,导致城市中心得到了国家的大部分投资,但是,却很少给农村地区带来特别的效果,此类发展结果可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发现,诸如肯尼亚、象牙海岸、扎伊尔和摩洛哥,那里存在没有发展的增长,只是加重了对农村地区的开发和贫困^[26]。

但是,也有让增长极理论得到好评的不少实例。增长极概念在区域规划者所面临的战略设计任务分析以及引导区域增长方面带来了特别的益处,1940 年到 1960 年的巴西圣保罗就很好地证实了增长极及其举措所形成的城市空间的增长就是由极点向外的趋势增长^[27]。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弗朗索瓦·佩鲁的基本观点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同时,也表明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区域背景下的发展极理论的工作是可行的^[28]。就当今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关于服务业在经济体中的持续增长所发挥作用,增长极可以提供更好的解释能力,有些情况下,服务业会凭着自身的规则来构建增长极,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助长增长极的活力^[29]。依靠自然资源所形成的增长极在推动拉美边疆地区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试验^[30]。在 20 世纪 60 年代,应委内瑞拉政府的邀请,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规划专家就在该国的南部创建了增长极,一个名叫“Ciudad Guayana”的城市也于 1961 年创建起来了,成了一个工业中心,后来又继续开展了政治、社会和环境轴的更新规划^[31]。在旅游业中,大的旗舰景点就扮演着增长极的角色,比如英格兰乡下的安尼克花园,就成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32]。在罗马尼亚,除首都布加勒斯特外,还有人口超过 30 万居民的七个主要城市,即克拉约瓦、蒂米什瓦拉、克卢日纳波卡、康斯坦察、雅西、加拉茨、布拉索夫,它们代表着该国人居网络的核心,它们在那里传递信息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也是该国主要的发展极^[33]。蒂米什瓦拉增长极是罗马尼亚的第六大城市群,蒂米什瓦拉增长极具有与自我身份地位相一致的增长能力来完成目标,即在罗马尼亚西部地区提供协同规划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扩散,当然,城市边缘区的发展也有利于强化整个城市地区及其核心地段^[34]。巴黎迪斯乐园作为一个增长极,已经涵盖了它在巴黎盆地东部郊区的直接和间接的溢出效应,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经济效益^[35]。1964 年法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虽然未将位于中央高原北部的克莱蒙费朗这座城市纳入八大增长极的范畴,但是最终还是于 1970 年纳进了方案之中,真正地成了规划后的增长极,并有效地阻止了法国中央高原农村人口的减少^[36]。印度的霍苏尔地区作为增长极是成功的,很多企业都在这个地区投入大量资金,但是,无疑,霍苏尔与班加罗尔的短距离则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落后地区的一部分,因为与班加罗尔靠近,所以才确保了产业的外部经济性^[37]。

现代增长理论似乎表明是技术转变带来了经济增长以及长阶段性的经济结构变化,但是,验证显示,增长极理论能够深有意义地解释长阶段性区域经济的的增长,而技术转变却不能在此作为一个可解释的变量^[38]。即使在增长极建立后的数年内,都未能通过净溢出效应来促进周围地区的发展,但是,作为增长极的规划者,仍应耐心地致力于自己的努力,在适当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平稳的环境中,一个地理位置好的增长极是具有活力的,如果规划远景足够长,增长极是可以作为区域性的政策工具而获益的^[39]。西班牙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极,如马德里,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当它们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集聚优势就开始超过本身所造成的拥塞成本了^[40]。委内瑞拉的拉科鲁尼亚和西班牙维戈增长极建设之所以不佳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其被当做增长极的时间跨度太短,仅介于 1964 到 1972 年之间,而西班牙的维拉格西亚用作增长极的时间跨度就达到了 10 年,相比较而言,西班牙的维戈还是比

拉科鲁尼亚成功得多, 它还设法吸引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41]。根据美国约翰逊县的实证分析表明, 增长的扩散也许会超过十五年的时长, 虽然这样的结果是诱人的, 不过通过这单一的案例并不能得到增长极的一般性结论, 特别是当增长的扩散受到聚落稀疏和距离阻碍的时候^[42]。增长极战略一方面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区域差异的扩大^[43]。正如本杰明·希金斯 (Benjamin Higgins) 所言, 在增长极理论的实际运用中, 不要过于沮丧失望, 因为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完美无缺的, 能够应对全部客体事件的通行理论在未来也不可能出现, 为此, 不得不相信, 应在城市增长和区域发展中做好规划与政策之间的彼此协调事务^[44]。也就是说, 增长极理论也不是万能万全的理论, 它也有自己的实用局限性。

2. 国内增长极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2.1 理论的发展

2.1.1 增长极理论的发展

增长极理论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传入我国, 很快被理论界接受, 一些学者用增长极理论来指导我国区域开发的实践, 一些部门甚至筹划过在具体的区域建立增长极^[45]。李新建等人认为增长极的认识与选择有三大步骤: 一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出发, 针对区域的性质确定什么产业为推进型产业; 二是从促进推进型产业迅速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其最大区域带动作用出发, 确定把推进型产业中的推进型单元 (企业) 配置在什么样的区位; 三是根据推进型产业的区位, 确定增长极, 推进型产业集中地或具有发展这种产业的优越条件地区便是增长极^[46]。狭义经济增长极有三种类型, 一是产业增长极, 二是城市增长极, 三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极; 广义经济增长极, 指凡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生长点, 其中包括制度创新点、对外开放度、消费热点等等^[47]。鉴于增长极具有经济和地理意义两层含义, 重建增长极使其成为推进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杠杆, 须将经济和地理意义上的增长极统一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历史意义上的增长极, 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形态转化的直接动力^[48]。增长极的区位变化, 带动不同地区经济的增长, 形成增长极的漂移, 增长极在原来的区位继续成长, 并结合环境的变化带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形成了增长极的叠加; 漂移和叠加是增长极成长的两种基本的模式, 促进经济增长必须创造适合增长极进一步成长的基本环境与条件^[49]。张战军提出了广义增长极, 它由低级产业向更高级产业更替, 工业增长极在农业增长极内部“胎生”, 并超越或取代农业增长极; 后工业增长极在工业增长极内部“胎生”, 并超越或取代工业增长极^[50]。

自然, 增长极的选择也要合乎中国的国情需求。创新是增长极的主要功能, 我国必然要经历由产业增长极和区域增长极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必须正确选择和培育我国知识经济的产业增长极和城市增长极^[51]。考虑到中国的国土面积大、各个地区的差异很大, 须对增长极进行分类, 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增长极, 在增长极的布局方面, 在增长极的规模、数量和间隔距离等方面, 要考虑“大、少、远”与“小、多、近”两种方式的结合, 由此配套不同的政策和实施主体^[52]。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一个增长极, 通过辐射作用, 产生大量的增长点, 为此, 应充分发挥高新技术的支撑作用, 在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尽快建立起中国经济基础的新型工业, 以此形成新的重要增长区域^[53]。鉴于我国人均土地资源稀少, 处于中期工业化阶段, 应重视以现有都市圈 (区域增长极) 为核心的区域开发思路和政策^[54]。在周一星提出的中国都市区连绵区界定标准中, 就要求有两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作为增长极^[55]。新时期发展增长极的基本思路应是按照我国自然地理条件, 依据现有基础, 遵循生产要素集聚规律, 结合主体功能区建设, 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 增长核心区和增长辐射区统一, 妥善处理不同地区增长极和不同类型增长极的关系, 构筑空间分布合理、规模数量适度、主体功能互补的多层次经济增长极体系^[56]。

此外,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城市群的增长极作用。在城市群内部,多个经济增长极构成网状系统,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使各个城市和城市之间地区都得到了发展,从而使城市群本身也得到了发展^[57]。单个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扮演增长极角色逐渐让位于城市群,大东京城市群已成长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洛杉矶区城市群成长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汉城大都市圈成长为韩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正在逐渐取代原来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成长为国家经济发展增长极,而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城市群也在逐渐取代区域内的中心城市成长为区域性的增长极^[58]。大城市群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其各种形态的产业集群联系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形成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使大城市群成为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各地均将城市群能级的提升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基础设施配套、政策支撑、产业引导等层面予以重点扶持,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集聚,城市群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59]。即城市群也具有增长极的功效,可以说,城市群就是个大型的增长极。

当然,增长极理论除了有其优点外,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值得关注。王仲智等人则认为成熟的理论应该注意到事物发展的两面性,不应忽视理论缺陷及其可能的负面性,佩鲁增长极理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增长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预见性不强,增长极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视了其战略实施的约束条件和适用范围,特别是作为普遍性的策略加以应用,必然导致经济资源的不适当集中与低效化^[60]。腹地在一定时间内能够承受其与增长极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增大所带来的压力,是增长极模式得以运用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在考虑运用增长极模式时,不能只关注开发效果,更应该首先关注腹地的承受能力^[61]。安虎森则认为增长极具有持续增长、经济规模大、市场规模大、创新中心四大特征,具有资本转移、知识和技术溢出以及在较发达地区的福利补偿等功能,增长极战略为非均衡战略,这种模式在较发达地区或国家比较适合,在欠发达地区或国家应用时,区内较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在贸易自由度上必须有梯度,即较发达地区实行高度开放政策,落后地区应实行循序渐进的开放政策,在欠发达地区提出培育增长极的口号时要慎重^[62]。以增长极理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不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应注意强化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克服极化效应带来的负影响;因此在制定增长极战略时,应在区位选择、主导产业选择、经济活动方式等方面强化增长中心的扩散效应,使增长中心在获得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带动其他落后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63]。

2.1.2 点轴开发理论与网络经济

点轴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深化和拓展。1981年,法国学者M·珀努尔进行了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轴的对比:增长点是所有的主导性产业活动都配置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而在这种微观地带建立起一种互补性关系,而没有对外界的反应;增长极,以在较大地带内围绕一个主要核心而存在着互补性关系为特征;增长轴,由一组增长点或增长极所组成,它们之间由于重要运输轴的存在而形成一种互补性关系;通常,不发达经济中只有增长点,只有在发达经济中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增长极或增长轴,如莱茵河、北意大利极,见表1^[64]。1984年,陆大道院士强调了点轴开发理论,即点轴等级渐进扩散式开发,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确定若干有利发展条件的大区间、省区间及地市区间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个点(城市及城市区域—发展中心)予以重点发展,发展轴线逐渐向不发达地区延伸,将以往不作为发展中心的点确定为低级别的发展中心^[65]。

表1 增长点、增长极与增长轴的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among growth point, growth pole and growth axis

经济空间	地方经济空间	区域经济空间	国家经济空间	国际经济空间
------	--------	--------	--------	--------

地理空间				
增长点	地方增长点	区域增长点	国家增长点	国际增长点
增长极		区域增长极	国家增长极	国际增长极
增长轴			国家增长轴	国际增长轴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在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集中在“点”上的同时,“点”与“点”之间就形成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形成的“轴”,这里的“点”指各级中心城市,“轴”指由交通、通讯干线和能源、水源通道连接起来的产业聚集带,由于它具有促进区域这个类似扇面发展的功能,称之为“发展轴”,“轴”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轴”也是“点”上社会经济要素向外扩散的路径方向,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以“点-轴”型式进行渐进式扩散^[66]。显然,这里所谓的“点”其实就是具有集聚作用的不同等级规模各类增长极,而轴线则是通过基础设施串联起来的增长极连线。但是,点轴开发模式与增长极理论并无矛盾之处。增长极和点轴系统模式形成的过程都是由于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先是空间聚集,后是空间扩散,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增长极是阐明各级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理论模式,点轴系统模式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模式,增长极理论侧重于空间结构形成的经济过程和经济联系,是高度工业化下的理论模式,而点轴系统理论更多是强调空间过程,是各个发展阶段都适用的理论模式^[67]。可见,点轴开发模式是比增长极理论更为完备的实用理论。

其实,增长极、点轴结构和城市群是完全衔接到一起的。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研究过。为了配合国家的“T”字形轴线开发,特别是在基建投资持续紧张的情况下,湖南空间发展战略只能采取倾斜性政策,我们的想法是,以城市、铁路及河流为主要依据,在省内地划分出湘东纵向、湘中横向和湘西纵向三大轴线开发地带,自东向西分阶段集中力量予以发展,在现阶段要以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核心,以岳阳为门户,以湘北和湘南为两翼,有计划、有重点地向西推进,从而形成点轴结合、重点突出的地域开发格局^[68]。中国学者在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网络经济,以此达成区域的均衡发展模式。区域开发,从其空间结构的演变看可分为点状开发、点轴开发和网络开发三个阶段,中国的区域开发,在总体上应采取点轴开发^[69]。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实体的分布先是出现在一些“点”,后逐渐连接成“线”并扩展成“轴”,又发展为“网”,后又表现为“面”,当今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英、法、德、美、日等),基本上已完成了“点→轴→网→面”的空间演变过程,在全国总体开发中,不同点、轴、网、面所处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显然具有层次性,一级网应是一二级轴交织成的全国性“纲”,二级网则是二三级轴交织成的省际经济区网,三级网则指三四级轴交织成的省级经济区网,四级网则指地方性基层经济区^[70]。点轴开发模式最后即走向区域发展差异平衡适中的网络面块,具体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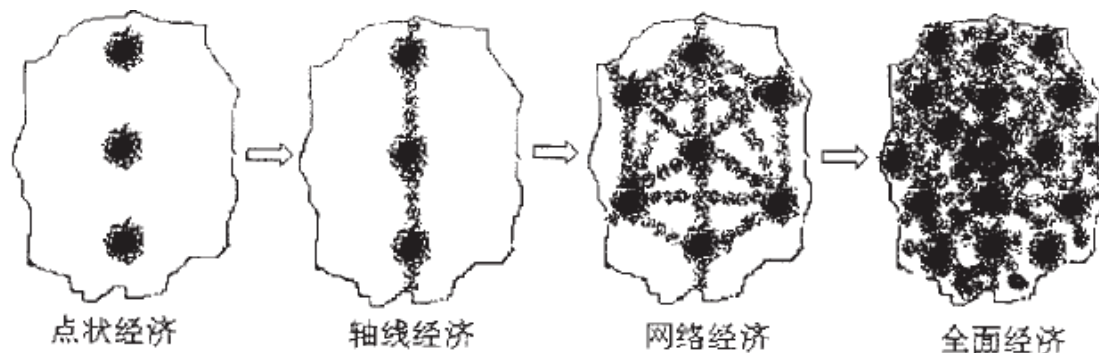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发展过程:点→轴→网→面(文献源自^[71])

Fig 1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point and axis to plane (souece from^[71])

2.2 实践

2.2.1 增长极理论的实践

在实践中,我国成功地运用增长极理论已取得了不少成果。1988年,李仁贵指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中心城市林立,已成东部沿海地区以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极”,当然,这并不是不发展内地和边远地区,内地和边远地区也已形成了一批增长极或发展极,在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重视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极或增长极的建设^[72]。十堰就是在三线建设期间通过二汽来形成了工业增长极,十堰市随着二汽的发展而兴旺,十堰市所在的鄂西北地区受增长极的扩散效应的影响,发展变化很大^[73]。依靠优越的区位条件、优惠的政策和良好的工业、技术、人才基础,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目前,我国高新区已形成了较强的示范作用、推动作用和辐射作用,开始产生了较强的乘数效应,不仅对自身所在地区,而且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开始发挥其增长极的作用^[74]。温州模式属于观念创新增长极,诸城模式则是体制创新增长极,苏州又是吸引投资型增长极,国家科技园区则归技术创新型增长极^[75]。通过中原城市群初步整合,以及内聚和外联两个方面的实践,发现内聚以营造现代都市区,构建能够带动城市群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外联以营造省域现代城镇体系,构建能够承载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区域支撑体系”^[76]。

不过,另一方面,增长极理论在实践中也不见得都是完美无缺的。实证分析表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地区的外溢效应只有10.9%,而且主要集中在对中部地区的外溢效应上,对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外溢性影响则十分有限,但是,产业层面上揭示出对中国内陆外溢性影响排在前5位的产业在三大增长极中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它们占到了三大增长极对内陆地区总外溢效应40%左右,这些产业的发展无疑对内陆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77]。可见,虽然中国东部三大增长极的部分产业的外溢效应显著,但是,中国三大增长极的整体扩散效应并不显著。增长极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行政部门必须冷静客观地对待增长极的激发效应和负面效应,以积极主动的对策校正增长极的正负面效应,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期战略,尽快促成增长极与边缘区域之间从分化到融合的转变^[78]。我国区域差距扩大的困境集中表现为增长极点极化过度和扩散不足并存所致的“极化陷阱”^[79]。综观我国不少落后地区实施增长极模式最终失败的案例,大都经历了以下的过程:地方政府大力在落后地区建推动型企业→企业生产率低下,缺乏商品市场开发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新企业无法发展,产业间无法形成连锁,要素无法向外扩散→增长极无法形成,暂时形成飞地经济→原推动型企业萎缩,经济发展受阻^[80]。

2.2.2 点轴理论与网络经济的实践

点轴开发模式在实际运用中,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在全国经济布局战略上,20世纪80年代以沿海为主轴,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自80年代末,大规模开发长江沿岸地带,构成“T”字型的宏观布局战略^[81]。东部沿海地带与长江沿岸地带成为全国一级重点开发的轴线,二者构成“T”字形的战略构想,长江轴将内地两个最发达的核心地区与海岸地带轴联系起来,两轴在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交会^[82]。国家采取这种“T”字形点轴开发战略是符合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的,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资金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东西向的横向经济运动和整体经济网络系统的形成^[83]。《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2000)中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要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形成我国西部有特色的西陇海兰新线、长江上游、南(宁)贵(阳)昆(明)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带动其他地区发展。

当然,在实施点轴开发模式时,也有值得慎重考虑的地方。鉴于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

并非要求千篇一律地实行点轴开发模式,具体情况还须具体分析。落后地区宜采取的是增长极点开发,发展中地区采取的是点轴开发,而较发达地区采取的是网络开发,任何一个地区的开发,总得先从一些点开始,然后沿着一定轴线在空间上延伸^[84]。即由点到线,再到面,这里的点便是增长极。现今黄河地带面临大规模强化开发,然而忽视生态环境问题也会使生产难以为继,因此在展开轴线开发之前必须进一步强调开发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轴线开发不是一朝一夕的任务,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85]。点轴模式更多的还是对已经形成的城市连绵带的图形描述,点形态的地域应该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产物,在不发达地区,特别是自然条件恶劣导致的经济落后地区,所有开发活动都是一种与地理障碍相对运动的过程,或者不断克服障碍使经济发展实现空间扩展,或者受地理障碍的约束而使经济发展最终局限在某个空间里,在那里充其量只能是点状的内涵发展而很难有外延扩展^[86]。换言之,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也会导致点轴开发模式的不成立或不完整。

3.研究展望

3.1 对增长极的等级体系的界定

增长极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无论是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都应当存在增长极,只不过增长极的等级规模有所差别而已。由此,形成不同等级规模的点或中心。进而组构成不同等级规模的轴、网、面。因此,找出一套适用的且具有普适性的能定量与定性界定不同等级规模增长极的方法,就显得异常重要。

3.2 对增长极与城市群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中心城镇,乃至整个城市群都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增长极。城市群本身是由若干个次级增长极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整体增长极。那么,不同增长极之间的实体空间整合、生产要素流整合、文化认同感的整合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对象,以此形成各级各类增长极与城市群综合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3.3 对增长极与城镇化关系的探讨

中国现在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大大小小的增长极凭借其自身的各项优势吸引着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乡村人口具有不断涌入大城市的势头,造成大城市不堪重负,进城人员有利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诱发了拥挤、混乱、职居远离、贫富悬殊、待遇不公、房价飙升等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那么,如何有效的治理和预防城市病,就变得异常重要。其根源在于,如何才能合理发挥各级增长极的作用,使其在集聚与扩散之间找到恰当的切合点,既不盲目集聚,也不低效扩散。让以城镇为依托的增长极既能恰到好处的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也能让生产要素做到合理配置,这无疑在未来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3.4 对增长极与区域关系的分析

贫穷落后地区有其符合自身特点的增长极,富裕发达地区也有符合其自身特色的增长极。找出并培育增长极的目的,不是在于一枝独秀,而是要让其成为带动落后边缘地区协同发展的动力源。也就是说,增长极应该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增长极,增长极最终应该是带动整个区域齐头发展的增长极。通过增长极来缩小区域差距是增长极事先强大起来的使命,并不是为了扩大区域差距而要让增长极强大起来,那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那么,如何通过增长极的引领作用,适时完成由极点到轴线,再由轴线到网络,最后由网络到面块的合理转变,最终达成区域均衡发展的最佳效果,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尤其是我国的现状,区域差异十分突出,除了因地制宜找到符合区域条件的增长极外,想办法通过增长极的成长来有效破解区域间的差异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此外,如何有效界定增长极的实体区域大小,也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4 结论

(1) 以增长极为主旨对象, 通过国内外两条主线, 分别回顾了增长极理论在国内外的
发展过程以及相应的实践结果。

(2) 国外自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增长极理论以来, 尽管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对增长极
理论的一些不足予以了指证, 但是, 总体上来说, 增长极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产生过不
少积极有效的贡献。

(3) 国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了国外的增长极理论, 并进行了理论的发展提升。国
内学者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完备、更加高级的点轴开发理论和网络经济理论,
并开展了一些列相应的实践工作, 取得了成功的案例。

(4) 最后, 在回顾了现有增长极理论以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未来增长极理论
的研究展望。展望内容主要集中在增长极的等级体系的界定、增长极与城镇化关系、增长极
与城市群关系、增长极与区域关系的互动研究方面。

参考文献

- [1]Buttler, F, A (Translated by Brown, J, C). Growth Pole Theo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ook Review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6, 14 (2) :528-530.
- [2]Parr, J, B. Growth-pole Strateg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A Retrospective View. Part1 [J]. Urban Studies, 1999, 36 (7) :1195-1215.
- [3] 郭腾云, 徐勇, 马国霞, 王志强.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与方法的回顾 [J]. 地理科学进展, 2009, 28 (1) :111-118.
- [4] Parr, J, B. Growth-pole Strateg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A Retrospective View. Part2 [J]. Urban Studies, 1999, 36 (8) :1247-1268.
- [5] 王缉慈. 增长极概念理论及战略探究 [J]. 经济科学, 1989 (3) : 53-58.
- [6] 江显华, 杨萍. 增长极与地域生产综合体: 西部开发的区域研究 [J]. 贵州社会科学, 1991 (11) : 34-37.
- [7] 苗长虹, 艾少伟. “学习场”结构与空间中的创新 [J]. 经济地理, 2009, 29 (7) : 1057-1063.
- [8] 侯永志, 张军扩, 刘锋, 何建武. 新时期布局、培育和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原则和思路 [J]. 发展研究, 2011 (12) :4-6.
- [9] 王询.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J]. 经济地理, 1991, 11 (12) :6-9.
- [10] [德]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常正文、王兴中译).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21-25.
- [11] Perroux, F. Economic Spa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0, 64 (1) :89-104.
- [12] Rodell, M, J. Growth Centers—Two Recent Contributions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75, 23 (3) :523-531.
- [13] Gorgievski, B., Jankulovski, N. Supporting Rural Centers for the Functioning of Regional Policy in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J].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Markets, 2011, 6 (1) :629-639.
- [14] Kuehn, J. A., Bender, L, D. An Empirical Identification of Growth Centers [J]. Land Economics, 1969, 69 (45) :435-443.
- [15] Boudville, J, R. Problem of Regional Economic Pla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6.
- [16] Campbell, J. A Note Growth Pole [J]. Growth and Change, 1974, 5 (2) :43-45.
- [17] [美] 埃德加·胡佛 (王翼译). 区域经济学导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325.
- [18] Higgins, B. From Growth Poles to Systems of Interactions in Space [J]. Growth and Change, 1983, 14 (4) :3-13.

- [19] Semple, R. K.; Gauthier, H. L.; Youngmann, C. E. Growth Poles in Sao Paulo, Brazil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2, 62 (4) : 591-598.
- [20] Murray, L. W.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in Poland: The Megeion of Growth Rowth Pole and Growth Center Theories [J]. *Antipode*, 1974, 6: 125-141.
- [21] Friedman, J., Hakim, S., Weinblatt, J. Casind Gambling as a "Growth Pole" Strategy and Its Effect on Crome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89, 29 (4) : 615-623.
- [22] Shinohara, M. Japan as a Growth Po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1987, 1 (1) : 100-124.
- [23] BoRB é Ly, L. Growth Poles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stem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nd Research Virgil Madgearu*, 2011, 1: 49-66.
- [24] Conroy, M. E. Rejection of Growth Center Strategy Policy i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J]. *Local Economics*, 1973, 49 (4) : 371-380.
- [25] Kuklinski, A. R. Growth Poles and Growth Centres in Regional Planning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74, 5: 1019-1021.
- [26] Maro, P. S., Mlay, W. F. I. .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pace in Tanzania [J]. *Africa*, 1979, 49 (3) : 291-301.
- [27] Sempkle, R. K., Gauthier, H. L., Youngmann, C. E. Growth Poles in Sao Paulo, Brazil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2, 62 (4) : 591-598.
- [28] Haddad, P. R. Experiments With Input-Output Analysis at the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 [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73, 7 (2) : 23-46.
- [29] McKee, D. L. On Services and Growth Poles in Advanced Economies [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87, 7 (2) : 165-175.
- [30] Hite, A. B. Natural Resource Growth Poles and Frontier Urb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4, 39 (3) : 50-75.
- [31] Irazabal, C. A Planned City Comes of Age: Rethinking Ciudad Guayana Today [J]. *Journal of Latin Amcncan Geography*, 2004, 3 (1) : 50-75.
- [32] Irazabal, C. Flagship Attractions and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he Alnwick Garden, England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 15 (2) : 125-143.
- [33] Peptenatu, D., Pintilii, R. D., Draghici, C.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of urban growth poles regarding national importanc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or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8 (4) : 737-746.
- [34] POPA, N. Stakes in Contention and Mutaions in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urban and Periurban Space of TIMIȘOARA [J]. *Revista Română de Geografie Politică*, 2011, 13 (2) : 109-132.
- [35] d' Huteserre, A. M. Disneyland Paris: A Permanent Economic Growth Pole in the Francilian Landscape [J]. *Progres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1997, 3: 17-33.
- [36] Thomas, S. Clermont-Ferrand: A Growth Pole? [J]. *Journal of the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 1996, 81 (2) : 133-141.
- [37] Heins, J. J., Meisher, E. N. Population Movements to a Growth-pole: The Case of Hosur, Tamil Nadu [J]. *Third World Planning Review*, 1990, 12 (3) : 231-247.
- [38] Thomas, M. D. Growth Pole Theory,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5, 34: 3-25.
- [39] Richardson, H. W. Growth Pole Spillovers: the Dynamics of Backwash and Spread [J]. *Regional Studies*, 1976, 10 (S) : 27-34.
- [40] Ayuda, M. I., Collantes, F., Pinilla, V. Long-run regional population disparities in Europe during

modern economic growth:a case study of Spain[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0, 44(2):273-295.

[41]Flanagan, P, O. Growth Poles, Regional Growth Ax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Galicia, Spain[J]. Tijdschrift voor Econ. en SOC. Geografie, 1979, 70(4):217-225.

[42]Isserman, A, M. Quasi-Experimental Control Group Methods for Regional Analysis:an Application to an Energy Boomtown and Growth Pole Theory[J]. Economic Geography, 1987, 63(1):3-19.

[43]Kim, E., Kim, K. Impac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n growth and equity of Korea:A multiregional CGE model[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2, 14:165-180.

[44]Moseley, M, J. From Growth Poles to Systems of Interactions in Space[J]. Growth and Change, 1983, 14:3-13.

[45]周良民. 增长极理论与西方的区域政策[J].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1994(7):70-75.

[46]李小建, 苗长虹. 增长极理论分析及选择研究[J]. 地理研究, 1993, 12(3):45-55.

[47]颜鹏飞, 邵秋芬. 经济增长极理论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1, 22(110):2-6.

[48]王小艳, 吴淑凤. 增长极理论的拓展与社会发展模式的重建[J]. 经济问题, 2005(1):13-15.

[49]段世德, 寿厉冰. 漂移与叠加—增长极的两种成长模式及启示[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5):81-84.

[50]张战军. 广义增长极及其生长[J]. 热带地理, 2008, 28(5):434-438.

[51]孙茜. 增长极理论与我国的知识经济发展[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0, 21(104):108-110.

[52]杜俊涛, 陈迅, 雷森. 等增长极理论的模型化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2, 25(4):103-106.

[53]Wang, D. Beijing-Tianjin-Hebei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Trend[J].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2008, 4(4):9-15.

[54]刘云中. 发展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国际经验[J]. 发展研究, 2011(7):11-14.

[55]Zhou Yixing (edited by Ginsburg, B, K., McGee, T, G). The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s in China:a preliminary hypothesis[M].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89-111.

[56]侯永志, 张军扩, 刘锋等. 新时期布局、培育和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原则和思路[J]. 发展研究, 2011(12):4-6.

[57]徐清梅, 张思锋, 牛玲, 雍岚. 中国城市群几个基本问题的观点述评[J]. 城市问题, 2002(1):18-22.

[58]刘静玉, 王发曾. 我国城市群经济整合的理论与实践[J]. 城市发展研究, 2005, 12(4):15-19.

[59]宁越敏. 中国都市区和大城市群的界定—兼论大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 地理科学, 2011, 31(3):257-263.

[60]王仲智, 王富喜. 增长极理论的困境与产业集群战略的重新审视[J]. 人文地理, 2005(6):34-37.

[61]颜鹏飞, 孙波. 中观经济研究: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再思[J]. 经济评论, 2003(3):61-65.

济研究: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再思[J]. 经济评论, 2003(3):61-65.

[62]安虎森. 增长极形成机制及增长极与外围区的关系[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90-101.

[63]张锦鹏. 增长极理论与不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探索[J]. 当代经济科学, 1999, 21(6):32-37.

[64](法)M·珀努尔(李仁贵译). 湖南省经济增长极研究[J]. 开发研究, 1997(1):28-29.

[65]陆大道. 二000年我国工业生产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J]. 地理科学, 1986, 6(2):110-118.

[66]陆大道. 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提出“点-轴系统”和“T”型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析[J]. 地理学报, 2001, 56(2):127-135.

[67]陆大道. 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 2002, 22(1):1-6.

[68]朱翔. 湖南省经济增长极研究[J]. 地理研究, 1991, 10(3):11-22.

[69]魏后凯. 区域开发理论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1988, 7(1):16-19.

- [70] 朱登兴. 论区域开发的点轴网面过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3, 21(3): 65-69.
- [71] 廖良才, 谭跃进, 陈英武等. 点轴网面区域经济发展与开发模式及其应用[J]. 中国软科学, 2000(10): 80-82.
- [72] 李仁贵.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理论与政策研究[J]. 经济研究, 1988(9): 63-70.
- [73] 曾艳红. 区域开发研究中的增长极理论及其应用—以十堰二汽为例[J]. 经济地理, 1992, 12(2): 4-8.
- [74] 吴林海. 论中国高新区的增长极作用[J]. 宁夏社会科学, 2002(2): 43-47.
- [75] 钱小平. 构建经济增长极实践回顾及理论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00(1): 43-47.
- [76] 王发曾, 闫卫阳, 刘静玉. 省域城市群深度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J]. 地理科学, 2011, 31(3): 280-286.
- [77] 潘文卿, 李子奈. 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地区经济的外溢性影响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6): 85-94.
- [78] 李小敏. 二元结构视野下对“增长极”理论的重新审视[J]. 江海学刊, 2008(4): 64-69.
- [79] 周密. “极化陷阱”之谜及其经济学解释[J]. 经济学家, 2009(3): 81-86.
- [80] 忻华强, 朱伟东. 增长极理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经济落后地区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J]. 社会科学, 2003(8): 17-20.
- [81] 陆大道. 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西部开发[J]. 经济地理, 2000, 20(3): 1-4.
- [82] 陆大道. 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J].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32.
- [83] 魏后凯. 走向可持续协调发展[J].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 38.
- [84] 魏后凯. 我国宏观区域发展理论评价[J]. 中国工业经济, 1990(1): 76-80.
- [85] 魏心镇, 韩百中. 沿黄河地带—我国国土开发布局轴线[J]. 地理学报, 1992, 47(1): 12-21.
- [86] 高斌, 丁四保. 点轴开发模式在理论上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几个问题[J]. 科学管理研究, 2009, 27(4): 64-67.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Study on the theory of growth pole

CHENG Qianchang

(The Center for Chinese Modern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n the theory of growth pole,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ory in study region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growth pole theory on basis of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theory of growth pole has achieved many successful cases, which can be proved in theory or practice. Especially, the theory of pole & axis and the theory of network economy have more usefulness in practice, which were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growth pole theory in china.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study. So, in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prospects in view of the actual problems.

Key Words: Growth Pole; Pole & Axis; Urban Agglomera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